

略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颜鹏飞 乔 倩

一、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

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是一种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模式。它作为经济运行机制的载体，决定其运行机制的性质和特点。运行机制则是指经济体制内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该体制运行的动因、规则和方式，从而决定经济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方式。不同的经济体制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和不同的资源配置或利用的模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生产关系、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或利用方式的调整和改革。经济体制从静态结构上看，一般可区分为自给型、计划型、市场型和混合经济型；从动态运行来看，其运行机制或资源配置模式有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两种基本形式。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或利用，取决于居民的直接消费；计划经济体制用统一集中的计划来解决资源的配置或利用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依赖价格机制的作用；混合经济体制则用市场机制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依靠政府手段解决资源利用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的基本目标和

基本内容，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或“转轨”，从而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要求，而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培育和规范要素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的改革则是经济体制转变的中心。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保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较之经济体制的转变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目标。经济增长是一种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亦即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换言之，它是一种生产力发展方式、经济方式或狭义的生产方式。西方学者大都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是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经济系统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关于经济运行的状况和增长动力结构的总称。经济增长方式有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粗放型和集约型，投资驱动型和效率驱动型，资源（劳动、资本和土地）推动型和科技推动型的区分。前者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亦即重投入、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供给主导型、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形态，后者则是

一种主要依赖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和劳动者素质来追求高质量、高效益的市场需求导向型、效益增长型经济增长形态。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目标是促成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其基本内容和要求是要从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大建设规模转到立足现有基础、把建设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改造、充实和提高上来；是要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的效率、降低消耗、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使国民经济走到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是从主要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转到致力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上来；是要从过去主要追求产值、速度和产品数量转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意产品质量、品种，提高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市场销售率上来。

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既有所区别又有所联系，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它们都受到一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都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有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粗放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出现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集约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则与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相始终。其次，经济增长方式又是受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制约和影响。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必然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变，能够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排除障碍，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能够有力地促进和保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否则，经济增长方式的单方面的改革难以为继。此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能反过来促进经济体制的转变，因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够提高国民经济的

整体素质、效益和活力，从而创造一个有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难以巩固。

综上所述，经济体制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同步进行，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目前情况看来，经济体制的转变已取得初步成效，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找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接、兼容和磨合的具体路径、方法和措施。尽管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二者的磨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和磨合已经历了几个世纪之久，许多问题未解决），但毕竟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扫清了主要障碍。因此，经济工作的着重点和中心将更多地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

二、论两大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分别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两种经济方式或生产方式。这两大经济方式有各自的特点，并且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我们可以采用投入产出系数（一般而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低投入、高产出），对经济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加以衡量和区分。投入产出比这一数量指标又可衍化为种种相关指标。如：劳动生产率，社会净产值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与能源消耗量之比，使用每一单位投资与所生产的产值之比等等。

但是，这两大经济增长方式既可分又并非截然可分。这两大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是相对的，它们是互相渗透的。粗放型经济，无论是高粗放型经济还是低粗放型经济，它们在生产要素大量投入，产值数量和经济规模

大力扩张, 以及项目建设速度加快的同时, 一般也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集约型经济, 无论是高集约型还是低集约型经济, 一般也伴随着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和生产要素的消耗。

就一个国家整体而言, 它要么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阶段, 要么处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阶段或者处于转轨型阶段。但是,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或种种其它原因, 并不排斥在局部范围或某些行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就是说, 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或支配地位, 并不排斥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占辅助地位, 在转轨时期尤其如此。正如一个国家就其整体而言, 要么搞社会主义计划体制, 要么搞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但是并不排斥某些特殊部门、特殊行业(如带有公益性的或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不纳入市场体制, 完全退出竞争领域, 退出市场体系, 搞直接的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控。因此, 必须在观念上跳出不切实际地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误区”。同时, 也要看到, 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局部转型到整体转型的过程。深圳特区有一段时间急于求成, 急于“升级换代”, 提出“赶走麻雀”(指劳动密集、技术附加值低的产业), “迎来凤凰”(指技术、知识或资金密集型企业)的错误口号, 把大量“三来一补”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往内地。结果很不理想, 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显著下降。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 我们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从全局着眼, 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来抓, 但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要从实际出发, 切忌不顾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急于搞一刀切的单一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政策或模式。

总的来看, 这两大经济增长方式是既互

相区别又相互联系和渗透。粗放型经济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 一方面不能从根本上否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进步性, 急于搞一刀切的单一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应该看到, 在某些落后地区、行业、部门和企业, 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并存的局面会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 我们从总的指导思想, 从全局从长期战略任务出发, 经济工作的重点和中心应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点不能因为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的特殊性而有所动摇。例如: 不能借口中西部地区落后, 而认为搞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仅仅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事。正确的做法是, 某些落后地区、行业和企业可以采取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并举的方针, 在大力缩短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进程的同时, 在高起点制定适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创造条件, 加快转型。中西部落后地区如此, 某些落后行业如铁路运输部门也应如此。

铁路行业落后是扼制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1993年营业里程53802公里, 相当于美国1865年(56315公里)水平和印度1913年(55762公里)水平。若按国土面积和按人口计算铁路营运里程, 我国铁路建设的严重落后程度更令人吃惊。因此, 铁路运输能力严重滞后。1993年, 我国GNP增长13.4%, 铁路运量仅增长3.1%。铁路行业的当务之急是高投入, 广铺摊子, 多上项目, 高速度地增加铁路营业路程。世界各主要国家都经历了以粗放型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为特点的铁路建设时代, 英国花了65年(1825—1890), 美国花了63年(1850—1913年), 法国用了62年(1848—1910年), 德国花了65年(1848—1913年), 沙皇俄国用了54年(1850—1904年), 日本用了54年(1884—1938年), 印度用去55年(1858—1913年)。我们要补上这一课。

同时, 应在完成两个转变的总指导思想

指引下, 不仅尽力缩短粗放型经济方式的历史进程, 加快供给主导的数量规模扩张型经济方式向需求导向的质量效益型经济方式的转化, 并且在高起点上制定铁路发展战略, 尽快实现铁路现代化。其中包括淘汰蒸汽列车(我国有将近 40% 蒸汽列车), 实行列车高速化(日本火车时速达到 275 公里, 西欧已达到 300 公里, 我国客运列车最高时速才 105 公里)和重载化(美国货车平均总重 4620 吨, 我国仅为其一半左右), 提高铁路复线率(我国 1992 年达到 25%, 日本达到 39.5%)和电气化率(我国 1992 年为 15.7% 日本为 57.6%)。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能性和迫切性

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奉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政策模式, 这同我们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经过近 50 年的经济建设, 尤其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推动, 我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进入工农自养和工农互补的“标准工业化”阶段, 出现了工业品和农产品买方市场(取消名目繁多的工农业产品购买票证就是一个证明), 亦即商品数量供给不足和市场需求的矛盾得到了根本缓解, GNP 和人均 GNP 达到一定水平。不少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粮食、煤炭、原油、发电量、钢、水泥、化纤产量已位居世界前 5 名之内(工业增加值却排在世界第 12 位), 从而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 为经济增长形态从供给主导的数量规模扩张型转为需求导向的质量效益增长型, 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不容否认和抹煞的, 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有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同时, 这也表明

我们已具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物质基础, 并且也具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体制条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陆续出台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正在从经济体制上为经济方式的转型拓宽道路。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具有迫切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甚至把转型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着重点”和“长期战略任务”。这种迫切性基于下述考虑:

(1) 商品供给不足和市场需求的矛盾已让位于资源短缺和资源高耗型经济增长的矛盾。这表现在: 我国耕地、水和某些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对不足, 如人均耕地已减少到 1.22 亩, 黄河已多次断流。其次, 资源的过度开发又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资源浪费严重, 物耗比重过高。能源利用率仅为 30%, 比发达国家低 20 个百分点。我国每吨标准煤消耗实现的 GNP 为 710 美元, 仅为发达国家的 1/3 到 1/9。1980—1994 年期间, 科技进步对 GNP 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 30% 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对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 若不及早转型就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不再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大量占用和消耗资源)而是主要依赖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

(2) 投入产出比率低, 经济效益低。“八五”时期每百元总投资仅新增国民生产总值 50 元左右。1953—1980 年, 我国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22 倍, 但国民收入仅增加 5.1 倍。1981—1993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13.7 倍, 国民生产总值仅增加 3.3 倍, 实现利税仅增加 2.7 倍。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 1980 年为 25.2%, 1993 年下降到 10.3%;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 1980 年为 25.6 元, 1993 年下降到 15.2 元。

(3) 技术进步缓慢, 企业技术装备落后, 我国经济增长的科技贡献率低, 企业的技术装备大多处于世界 60—70 年代水平, 工业企业设备近 1/5 老化, 超期服役率达 40%。机电行业中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水平的只占 1/3, 达到目前世界先进水平的只占 5%。冶金工业中部分技术装备水平比国外先进水平落后 10—20 年以上。

(4) 经济结构不合理。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与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并存。棉、毛纺生产设备利用率只有 75%; 电视机、电冰箱、卷烟、汽车和普通机械等生产能力闲置 1/3~ 1/2。工业发达国家炼油企业生产规模年均 500 万吨, 最大炼油厂年产 3000 万吨, 而我国 116 个炼油企业平均规模仅为 167 万吨。我国 80% 的汽车厂年产量不足 1000 辆, 而日本、美国以及韩国等, 一家汽车厂年产量就是几十万辆。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克服经济发展中处于深层次的困难和矛盾的有效途径。这些困难和矛盾主要归结为: 第一, 经济总体运行质量不高, 国有企业 1994 年亏损为 45.9%, 比“七五”期末增加 14 个百分点, 亏损额达 344 亿元, 比“七五”期末增长 17%。国家每年把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的 70% 以上投到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实现的 GNP 增量在全部 GNP 增量中不足 20%。第二,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 GNP 增长速度。1980—1994 年,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年均增长 17.7%, 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1.2%。1995 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 6188 亿元, 仅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0.8%。第三, 通货膨胀频繁(1980, 1985, 1988, 1994 年) 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源于过度追求产值和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从经济国际化趋势和参与国际竞争来看, 不搞需求导向的质量效益型增长方式不

行。国际经济竞争已由价格为中心的竞争转变为质量为中心的竞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使我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外商企业已大批涌入中国市场, 我国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综上所述, 解决这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 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尤其是把着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

四、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怎样实现转型? 总的方向就是中央一再重申的: 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注重结构优化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 即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 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强企业管理及宏观经济管理的轨道上来。各个地区、行业、部门和企业也应制定符合实际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其中, 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注重经济效益, 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1. 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与集约型经济正好相反, 粗放型经济的特点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水平低, 经济附加值不高, 投入生产要素的物耗效率、劳动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低。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症结就是提高国民素质, 尤其是劳动者的素质。

德国是一个劳动力匮乏、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 但是在受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后, 能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它在世界贸易额中居世界第二位, 以在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额中占 20% 而居世界首位。他们的经验是: 拥有劳动力素质的优势和科技优势, 才会有

产品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德国企业把 5~10% 的投资用于人员培训, 其用于职业培训的费用超过国家高等教育的经费。

据 1995 年劳动部职业技能开发公司公布的资料, 我国 1.2 亿城镇企业职工中,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68%,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2.6%, 全国约 7000 万青工中达到高级工的仅占 3%, 严重影响了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就业问题的解决。1993—1994 年产品质量合格率约 70%,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 15%,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29%。远低于发达国家 60~80% 的水平,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35% 左右的平均水平。据欧洲一些国家统计, 工人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级, 劳动生产率就提高 10~20%。而我国许多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及美国的 1/10。

因此, 实施科技兴国战略, 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相结合,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培育各行各业急需的高素质人才, 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关键。

2. 注重经济效益

粗放型经济是从产值和速度的增长中求效益, 而集约型经济则是从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优化、规模经营、管理和科技进步上要效益。其中, 从经济结构的优化中提高经济效益, 是重要的一环。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 制定适合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要求的产业政策, 支持支柱型产业和基础产业, 正确处理“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的关系, 妥善解决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过剩与基础工业、重化工业、高技术产业、第三产业落后的矛盾, 重新调整国有资产的总量、结构与布局, 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例如, 农业是基础产业, 而我国人多地少资金缺乏, 属于弱质产业, 不能象欧盟或日本那样搞巨额的价格补贴来刺激生产发

展, 也不能象美国那样搞耕地大规模经营。我们应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在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 跳出单一搞粮食作物的旧传统农业结构, 实行种植业和养殖业复合发展, 优化农业结构, 促成由传统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向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三元结构转化, 并积极发展以种养业为原料的加工业和运销业, 从而推动建立能充分提高初级产品生产效益以及农业比较效益的高效农业体系。

金融业也存在资产结构失衡甚至畸形的问题。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突破了国家垄断金融和银行信贷资本供给制两大制度性陷阱, 为金融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条件。而调整以储蓄为主要成份的畸形金融资产结构是当务之急。在这种单一的储蓄为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中, 风险小的间接融资相对直接融资比例过大, 每年对个人金融资产(主要是近 3 万亿元的个人储蓄)利息支出 4 千亿元, 银行包袱过重, 承担风险过大(金融资产风险不应全部由国家或国有银行来承担)。应把资金从储蓄中分流到国债(西方发达国家发行国债的警戒线是不超过 GNP 的 60%, 我们发行国债规模还不到 10%)、股票、债券中去, 这样才能把银行搞活。企业拓宽筹措资金的渠道, 并以股票等形式从多元化资本市场上搞钱, 其成本大多低于银行贷款利息, 企业也搞活了。

二是优化企业组织结构, 应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兼并、破产、组织专业化协作, 加强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长虹等竞争力强的彩电生产企业通过大幅度降低价格, 从而兼并竞争力弱的电视生产厂家, 就是一个范例), 以及按规模经济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责任编辑: 王 冰)